

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与泰国博乐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研究

宋国敏, 廖海鹰, 曹海燕 (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热带作物技术系, 云南普洱 665000)

摘要 结合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与泰国博乐大学合作办学“2+2”人才培养模式, 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途径、培养制度等方面对两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比较, 并对其差异进行分析, 旨在使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快速发展。

关键词 国内高校; 泰国高校; 人才培养模式; 差异分析

中图分类号 S-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4)36-13165-02

1 概念界定

“人才培养模式”是社会关注和研究较多的一个领域, 对它的概念解释也是各不相同^[1-2]。阴天榜在《论培养模式》中指出: “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包括: 目标、课程、培养制度、培养途径等一系列过程”^[3]。杨学新和梅玉明在《省属综合性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中指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 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应该朝着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发展”^[4]。该文所指的人才培养模式是: 根据社会发展需要, 为培养出适合的人才采取的培养方式, 其内容包括: 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途径、培养制度等。

2 合作实践

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与泰国博乐大学确定了长期的“2+2”专升本联合办学人才培养模式, 即在该院读2年, 可以转学分到泰国续读2年。学生到泰国博乐大学后, 泰国博乐大学会根据留学生选择的专业进行1年强化英语或泰语培训, 培训成绩记入学分。第2年就读相关专业课程, 学期结束, 考试通过规定学分, 颁发泰国博乐大学本科文凭。同时, 成绩合格也可取得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专科的毕业证书。在此期间, 该院委托泰国博乐大学对学生进行为期1年的教育和管理。因为该院专科教育实施“2+1”人才培养模式, 即在该院就读2年, 第3年在泰国博乐大学就读, 进行专升本学习。因此, 学生第3年是两校共同管理, 学生第3年在泰国博乐大学所学课程学分要互换到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 经认可则可取得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专科文凭。

学生“2+2”的学习过程, 有两个阶段的课程学分要互换互认: 第一阶段是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前2年的课程学分要互换互认到泰国博乐大学, 第二阶段是学生到泰国博乐大学第3年的课程学分要互换互认到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学生完成两校各自学分, 才能分别取得两校各自文凭。

两校合作办学的时间不长, 虽然目前进展顺利成功, 但尚处在摸索阶段, 仍存在因差异引起的诸多问题。

3 比较分析异国两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

3.1 不同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是以多元化、特色化、市场化的模式为主, 培养

“应用型”的专门人才。泰国博乐大学则较全面, 既做到本土文化传承又吸收了欧美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重视传统文化、主要围绕社会需求和“复合型”人才为主^[5]。

3.2 社会需求人才不同

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主要据区域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 培养适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专多能的应用型人才, 课程设置突出培养目标和核心课程, 所修学分也比泰国高校多。泰国博乐大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复合型人才。泰国的工作分工非常细, 如从事科研工作 和教师教育工作是分开的, 我国则是教学与科研并重。

3.3 历史文化发展不同

我国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 近代的发展主要受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影响, 课程学习中都离不开思想政治类课程, 特别是思想道德修养这门课程。泰国的历史文化相对我国而言就存在差距, 自1949年进入泰国时代后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都很快, 文化主要是吸收了西方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 所以高校在课程设置上较重视跨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课程的学习。

3.4 教育资金投入不同

我国近年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教育事业经费投入有很大增长, 云南省对“十二五”期间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是300多亿元, 数目看似庞大, 但是云南省的高等院校较多, 经费投入到各个高校远远不能满足学校的发展需要。泰国高校教育事业除了政府的经费投入外, 还由学生提供。相对我国高校而言, 泰国高校学生所交学费较高。目前, 云南省公立高等院校招收学生的学费是很少的, 特别是农学专业类学生学校每个月还给学生一定的生活补助费^[6]。

4 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与泰国博乐大学合作的构想

4.1 合作机遇

4.1.1 政策支持。

国际教育合作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促进各国高校教育进步的必然之路。云南省和东盟高校的教育合作随着东盟和云南省在政治、经济上的不断发展也受到各国的加倍关注。2012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上, 云南省政府与泰国教育部私立教育委员会签订了合作协议。云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把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区域特色建设设为教育发展重点工程扩大教育开放, 加强以东盟国家为重点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 多方式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云南省很重视国际教育合作事业的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而泰国政府对国际教育合作也很重视, 随着东盟经济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宋国敏(1965-), 男, 河南内乡人, 教授, 硕士, 从事热带作物病虫害教学与运用推广研究。

收稿日期 2014-10-27

的发展,就更加重视与云南省高校的教育合作。

4.1.2 成功例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确定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来华留学的东南亚留学生逐年增多。云南省拥有国际国内区域合作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并且高度重视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十一五”期间,云南省与东盟国家教育合作发展迅速,特别是与泰国高校间的教育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功。较有代表性的是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先后在20世纪90年代就充分发挥其小语种基地的作用,在所有非通用语种本科专业中都实行了“3+1”培养模式(三年在国内学习,一年到语言国学习)^[7]。该院与泰国博乐大学实施“2+2”人才培养模式合作的人才就业率都很高,为东盟经济事业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有了以上人才合作培养的成功案例,两校专业人才培养合作定能取得巨大成功。

4.1.3 文化优势。云南省与泰国两地社会文化相通,这为两校专业人才培养合作提供了很大优势。了解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培养合作的主要条件之一,通过对两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得知:两地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人才培养途径、人才培养制度等方面存在相同之处,主要原因是泰国自古受东方文化影响,泰国华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人数众多。良好的文化基础优势更有利于两地高校专业人才培养合作。

4.2 合作策略

4.2.1 制定人才培养合作目标。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统领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对人才培养过程起指导性作用,所以制定人才培养目标至关重要,是两校专业人才培养合作的首要任务,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考虑:第一,以两国社会制度和管理体系的不同为出发点,考虑两国具体国情。第二,以两国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为准则,立足两国社会发展需求,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第三,以办学条件为参考,不脱离合作学校办学条件的实际。第四,以适应两国共同发展为目的。第五,以东盟发展所需人才为主。

4.2.2 合理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内容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两校课程差异较大。进行人才培养合作就要重新设置课程内容,符合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是关键。首先从两校现有课程设置进行分析和总结,课程设置一定要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其次课程内容一定要服务于课程培养目标。

4.2.3 合理设置培养途径。因为存在差异,两校进行人才培养合作时培养途径如何制定是关键问题。培养途径主要包括教学活动、学术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教学活动主要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具体过程,两校专业人才培养合作是国际教育的合作,教师的选择条件相对较高,要具有很高的水平,学生也要择优入取,国际教育对语言的要求很高,所以招收的学生最好在语言上具有优势。两校专业学术活动具有明显差距,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较重视学术活动,而泰国则相反。如何制定学术活动内容是两校专业人才培养合作较棘手的问题。学术活动的不同,归根结底是人才

培养目标的不同,既然是国际教育合作,则是水平越高、能力越强、技能越多越好,所以两校专业培养合作时应该重视学术活动的培养。两校的社会实践活动基本相似,但之前两校社会实践活动都是根据当地人才培养目标、社会需要和实际情况而定,所以社会实践活动应根据两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2.4 合理设置培养制度。首先是招生制度。招生制度是指学校根据教育部规定对学生进行人才选拔的过程。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在招生制度上较严,而泰国的招生制度较宽松、灵活,两校人才培养合作是根据东盟发展需要采取的国际教育合作培养人才的方式,应该严格招生制度,招收相对优秀的学生以培养出更好的人才。其次是学位制度。其主要不同点是要完成的学分不同,所以应该降低学分,删除不必要的课程,着重培养重要课程。

4.2.5 优化师资队伍。提高人才培养合作的质量,优化师资队伍建设是主要的任务^[9]。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学生教育的指路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离不开教师。两校专业人才培养合作必须有一批思想素质高、理论水平、技术水平、外语水平过硬、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专业教师。可以增加教师数量,改变教师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多给教师创造外出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使其更好的胜任工作岗位。

5 结论

总结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与泰国博乐大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发现:前者培养的是一专多能的“应用型”人才;课程设置是基于行业分析、岗位需求,同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开设的一些较核心课程;师资符合我国高校办学的基本条件,但师资力量相对较弱,高职称教师比例较小,师生比例相对较大。后者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课程设置比较重视专业类课程,大部分课程更接近其本民族特色;教学条件较好;招生制度较灵活,学生选择性较大。两所大学的办学条件基本相同,从专业人员数量相比,前者明显高于后者,从平均占有量来衡量,后者的教学条件好于前者;人才培养途径中教学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基本相似,但从学术活动相比,前者较重视学术培养;二者学位制度基本相似。

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可以借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合作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运用外部机遇完善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国际教育合作伙伴,以期推进教育事业与国际接轨,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EB/OL]. <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b/2005-08-03/51175.shtml>.
- [2] 新华社. 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EB/OL]. (2006-10-31).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6-10/31/content_7295388_2.htm.
- [3]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 (2009-12-11) http://www.gov.cn/zwqk/2009-12/11/content_1484887.htm.

地没有新鲜水井,只有一些从尼罗河渗入的水井。尼罗河水从苏丹的高地携泥而下,形成了冲积洲,正是这种特殊的方式在维持着古埃及的农业灌溉^[12]。尼罗河每年从7月开始水位上升,通常从8月开始出现洪水,8月中旬到9月末洪水淹没了河谷大部分底部,并冲洗了土壤中的盐分,沉积了一大片淤泥。在每年10月和11月尼罗河水位降低以后,人们开始播种主要作物,次年1至4月间作物成熟。4~6月是尼罗河水位最低的时间,正好开始收割了^[13]。由此可见,在古埃及,它的农业生产紧密契合于这种自然的规律。而到了中王国时代这种发展模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中王国诸王从第12王朝法老塞索斯II世开始至阿蒙尼姆赫特III世时对法尤姆地区的水利浇灌工程的建设 and 开发。他们在这里建筑堤坝,控制和利用水源,并且排水,开垦良田等^[14]。然而古埃及的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因为这些而得到飞速的发展,相反,几千年来却是步履艰难,发展非常缓慢。

历史见证着,独特的地形条件和发展意识使古埃及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按自己的道路独立发展着。虽然经过中王国时期法老的努力,最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简单的河渠系统和土地的开拓给古埃及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的繁荣。而后来的法老只是维护,并没有突破性的建树。直到亚历山大引领希腊文化渗入以后,两种文化的融合才为古埃及的经济发展又增强了一道曙光,促成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大规模的法尤姆开发工程和复杂的灌溉网系统的工程建设,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其实在希腊力量渗入之前,亚历山大就早已羡慕着要去控制和运筹古埃及这块古老的土地了^[15],这种热情也为后来托勒密埃及的成就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些也是促成托勒密埃及早期经济繁荣状态的重要因素。

从埃及劳动者角度来说,托勒密王朝虽然是一个外族人建立的统治,但与波斯人的统治状态相比,所受到的剥削程度有所减轻。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古埃及是一个神性统治占主要地位的国家,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得到了充分地尊重。埃及国王的神性统治思想,在国家混乱的时期,可能是模糊的,或者是淡化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一直存在^[16]。希罗多德也认为专制的法老、纪念性的建筑、宗教式的文化,这3点在亚历山大那里得到了充分运用。实际上,即使有一

方面发挥好了,也会在古埃及产生历史性的吸引力^[15]。历史事实也确定地告诉后人亚历山大及其后来的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在这些方面继承式地做法都迎合了这一点。因此它的统治也就相对地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也就更能提高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经济繁荣准备了生产力基础。另外,托勒密王朝对土地的开发和规划,保障了大片土地的有效利用,同时也使得各个阶层的人民有了生存的基础,这对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 小结

托勒密埃及时期农业经济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统治者在古埃及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作为希腊民族的文化元素,再加之有效地管理,从而形成了托勒密王朝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摸索出了一条复合式经济发展的道路。历史证明,托勒密王朝这种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埃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了地中海世界粮仓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MANNING J G. Land and Power in Ptolemaic Egyp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6, 28.
- [2] BOWMAN A K, ROGAN E L. Agriculture in Egypt from Pharaonic to Modern tim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7.
- [3] 刘文鹏. 古代西亚北非文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0, 12.
- [4] J·基一泽博. 非洲通史(第一卷)[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527.
- [5] 希罗多德. 历史[M]. 王以铸,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115.
- [6] 威廉·杜兰. 世界文明史(卷一)[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9: 41.
- [7] BAGNALL R S. Egypt in Late Antiquity[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
- [8] LLOYD J G. Alexander the Grea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7.
- [9] 阿里安. 亚历山大远征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87-88.
- [10] EHRENBERG V. The Greek States[M]. Oxford, 1961: 215.
- [11] 格兰特. 世界文明史之六: 希腊的衰落[M]. 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68: 130.
- [12] WALLIS BUDGE E A. The Dwellers on the Nile[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7: 103.
- [13] 刘文鹏. 古代埃及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3.
- [14] EDWARDS I E 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 part 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510.
- [15] VSUNIA P. The gift of the Nile[M].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249-265.
- [16] ROSTOVITZEFF M. A Large Estate in Egypt in the Third Century B. C. A Study in Economic History[J].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922, 42: 292.

(上接第13166页)

- [4] 中国-东盟中心. 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2015)[EB/OL]. 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2-02/27/c_131433868_4.htm.
- [5] 杨学新, 梅玉明. 省属综合性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研究与实践[J].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6(4): 19-22.
- [6] 阴天榜, 张建华, 杨炳学. 论培养模式[J]. 中国高教研究, 1998(4): 8-

- 15.
- [7] 周华梅. 全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J]. 阴山学刊, 2012(5): 92-95.
- [8] 张林娜, 周琦. “3+1”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新途径中[J]. 科技创新导报, 2010(6): 199.
- [9] 江潭瑜. 中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与借鉴[J].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07(4): 61-64.